



ARS 10年

亲历者的回忆

万希润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ARS 10 年

——“非典”亲历者的回忆

万希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SARS 10 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万希润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039-5596-9

I. ①S… II. ①万…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262 号

SARS 10 年 —— “非典” 亲历者的回忆

主 编 万希润
封面摄影 贺延光
责任编辑 董 耘 胡 晋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596-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SARS10年

——“非典”亲历者的回忆

用生命铸成的历史(代序) | 刘又宁 / 1

SARS, 一个国家的应对及其公共政策选择 | 李 菁 / 1

SARS 疫情, 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 改变了这个国家公共政策选择; 而中国的选择, 则又必须在国际规范的框架之内。十年之后的观察, 这种变化是清晰的, 但改变并未结束。

“非典”亲历 | 周宝桐 / 20

我的体温再度升高, 人有点迷糊, 我想我不会就这么不行了吧, 还没告诉家人, 遗嘱也还没有立呀。

回忆“非典” | 余旻虹 / 25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层的一排阳台, 不一会儿老公一手举着输液瓶出现在视线中。我们开心地笑了, 虽然我的眼角还带着泪。

我很好, 一切平安 | 王 剑 / 33

翻看完日记, 妻子(十年前的她)和女儿已经进入梦乡; 看着她们熟睡的模样, 我想我知道我应该怎样生活! 明天要给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她: 我现在很好, 一切平安!

“非典”实录 | 曹冬焱 / 38

在层层包裹(4层衣服, 4层口罩, 3层帽子和2层手套)

的里面，觉得全身都难受，尤其是呼吸，根本透不过气，一直能听到自己好像一只狗一样大声地喘气。

SARS 日记 | 贾秀秀 / 44

我去给她输液，她总是很艰难地在纸上写上歪歪扭扭的“谢谢”，让我的眼睛总是湿湿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 | 茅江峰 / 49

此时，病人的脸距离我只有10cm，呼呼的气体喷在我的脸上。我尽量扭过头，尽力避开，却不能逃避。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我怎能眼看着需要帮助的病人却无动于衷呢？！

永不磨灭的记忆 | 周翔 / 60

直到我自小汤山隔离归来，父母见到我光头的形象，才知道这两个月发生的一切，不由得老泪纵横，相拥而泣。

一场阳光下的战争 | 王郁 / 68

当年光棍一条，老婆闺女都还没有，年轻也更愿意炫耀技术，还真没想万一传染的后果，也就更谈不上思想斗争、思前想后，都是为了病人如何如何。

重温历史 珍惜生命 | 崔娜 / 72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病房里，SARS期间英勇牺牲的我们的医护兄弟姐妹们最终抱憾离去，她们走了，我们还在，带着她们的期许，完成她们未竟的事业，成为所有一线医护人员灵魂深处的情结。

SARS 一直离我们很近 | 朱华栋 于春华 / 77

我清晰地记得一位SARS病人眼中的恐惧和绝望，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性，当被确诊为SARS，需要转到SARS隔离病房时，他的眼神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SARS 时期的那场永别 | 于 莺 / 83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最后道别，弥留的她努力想要伸出手，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她苍白的手上，几乎透明。

SARS 的记忆 | 刘正印 / 86

我们每个医护人员在买饭时，看到食堂的师傅们那比我们还要严密的防护措施时，大家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会意的微笑。

抗击“非典”十年感悟 | 许文兵 / 91

协和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也多少折射出协和医院一直秉持的专业精神。

SARS 时的特殊病房 | 邵 池 / 95

就在这时，救护车从东院区又送来一个新病人。竟是我上个月在感染科病房的领导 W。没想到半个月没见面，再次见面却是以医生和病人的身份。

那年我还是只菜鸟 | 王 迁 / 100

那天晚上我乘坐救护车一共 6 次呼啸着经过天安门，看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自我感觉那是非常的拉风。不过后来，我得知外院一位 ICU 主任就是在急救车上转运 SARS 病人时不慎感染而牺牲的，又让我不寒而栗。

SARS 往事与感悟 | 黄宇光 / 108

有一名年轻的护士，要给 SARS 患者做静脉穿刺输液，因为患者静脉难以显露，加之护士戴着护目镜和多层手套，无法完成任务，情急之下，这位护士脱下了手套并且静脉穿刺，一针见血。

SARS 十年记 | 徐 庆 / 113

一个干瘦的、略驼背的老头儿，顶着一头白发孤单地站在空旷的街上，向空中挥着手，这要是让路人看到，准

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吧。可就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来，只是为了向马路对面玻璃窗中的人挥一挥手。

“非典”记忆 | 曹冬焱 / 127

负责相关事宜的一位领导为了照顾我没有家人相迎，怕我难过，还特意嘱咐跟我一同进入隔离区的同事兼姐妹张颖大夫也不让家人来迎接，事后得知此事我愧疚无比。

不愿触碰的记忆 | 金滢 / 133

看到有些护士与送行的护士长抱头痛哭，我才突然意识到 SARS 病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内心的恐惧袭来，心中凄然：这不会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吧？

回顾历史是让历史不再重复 | 龚晓明 / 139

庆幸的是，我们管理的大部分 SARS 重症患者得以康复，但是也有几个重症患者去世，这其中就包括了王晶。凄惨的是，从入住 ICU 病房，到火化遗体，家属都无法见一面。

2003年，春天的故事 | 周希亚 / 143

那一年我还是住院医生，工资不多，一直不舍得买手机。父亲劝我：“买一个吧，哪天医院需要你进隔离区，我和你妈还能给你打电话。”

回忆 SARS | 张颖 / 146

一个天蒙蒙亮的清凉早晨，我独自坐在急诊外面的台阶上，想他十有八九并非 SARS 患者，但大概没有多少时日了，人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可能真的已经无欲无求、视死如归，忽然间有些恐惧死亡，更加恐惧孤单。

一抹温暖的色彩 | 蒋宇琳 / 151

下午4点多的阳光温暖地从窗户洒进来，把斑驳的树影投在了墙上；老王安静地躺在病床，沉沉地睡着了；窗外，家人站在车顶上满怀希望，默默地守望着……

SARS 回味与沉淀 | 王 阳 / 156

送别父亲的时候，看着他逐渐远去略显蹒跚的背影，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伤。回到宿舍，我立即给几个最铁的哥们儿挂了电话，没说别的，只是拜托我离开家的日子，家中有事帮我照应。

生命之树常青 | 茅江峰 / 159

那个手机，还是放在床边，始终处于通话的状态。在我们抢救的过程中，一声一声的呼叫，从手机中传出来。“爸爸，爸爸，爸爸你说话啊？！”“老公，老公，你说句话啊！！”

点名 | 王 仲 / 164

友谊，只有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才能经受考验。这些朋友没有觉得我是“大病毒”，没有疏远、躲避，相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支持在一线工作的我。

在渐渐忘却的记忆中续写光荣 | 谢志毅 / 167

如果我去了，请把女儿留给我的爸爸妈妈，那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你一定要再找个好人嫁了，不要让孩子、让你对我的回忆拖累了你后半生的幸福。

花好月圆人团圆 | 沈炎娟 / 169

挂断电话后，值班护士长赶紧按照家属告知的方向找个窗户向外望去，真的有个小伙子站在一辆汽车的顶上，拿着望远镜在观望病房。

惊恐中的坚强 | 曹晋红 / 173

终于到了我进发热门诊的时候了，爱人把我一直送到医院门口，我进去了，回头看去，他还在马路对面望着我。

关于 SARS | 杨 帷 / 179

她的情绪不太好，但她的老公从始至终鼓励她安慰她，没有一点不耐烦。后来，最后确诊了她得的是“非典”，

要把她转走了。她的老公仍然坚持要陪着她。

SARS 随想 | 姚运纹 / 185

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变得空旷如机场跑道，熙熙攘攘的簋街变得寂寥宁静，莫名的恐惧撕裂着每个人的心。

照片的回忆——“非典”的印记 | 张时民 / 188

这幅作品被选入医院当年印制的抗击“非典”画册中，后来在医科院举办的摄影比赛中还获得二等奖，到目前为止，它还被悬挂在医院一楼的走廊中。

SARS 十年回顾 | 张 峰 / 195

我来这里为她们拍照，其实也有些壮烈的感觉，甚至想到这个照片可能是某人的最后工作照。

一名检验工作者的回忆和感受 | 张时民 / 202

我有支气管哮喘的疾病，平时运动量大了都要大喘几口气，穿上隔离服后感觉特别的憋闷，感觉氧气不够用，总要张开口进行深呼吸。每天下班后脱掉隔离服和口罩都要仰天大吸几口气，好像要将这6小时内没有吸足的氧气尽快补充回来。

追忆“非典”点滴 | 贾大成 / 207

为了避免市民的恐慌，大批转运病人都是在夜间，每次都是几十辆救护车排成一字长蛇，蓝灯闪烁，如同一条彩带在夜空飞舞……

亲历 SARS | 王广发 / 210

SARS = Sacrifice(牺牲) + Appreciation(欣赏) + Reflection(反思) + Support(支持)，SARS教我们学会感谢，感谢你们在危难之际做出的牺牲(Sacrifice)，感谢你们为整个社会作出的贡献，我们欣赏(Appreciation)你们的努力，并反思(Reflection)我们的工作和人生态度。你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会加倍努力，给你们最大的支持(Support)。

白色岁月中的真情 | 张海澄 / 219

真有憋不住的，让家人送来了尿不湿，戴着尿不湿上岗，膀胱倒是轻松了，可两腿间越来越重，还潮乎乎，另一种难受！

留给未来的回忆 | 常 玲 / 223

当时我们二人已经没有时间送孩子回老家，没有办法，请医院出具了一份证明：孩子父母为“非典”一线工作人员，请在旅途中予以照顾。我当时已经进入“非典”一线，带着这封信由我爱人把10岁的女儿托付给列车长……

难忘的30分钟 | 杨 超 / 228

有那么几秒钟，很热很闷，总觉得喘不上气，周围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声音，感觉很恐怖，那就好像一个人在临死前竭力呼吸，我突然想，如果我感染了“非典”，老爸老妈怎么办？

营造温馨舒适的“家” | 吴志敏 / 230

实际情况是：我的婆婆脑出血偏瘫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家里雇的保姆因怕传染，早晨还闹着要回老家。

“非典”趣事 | 周昱辉 / 234

从此我再也不用像孟姜女等丈夫一样等着垃圾车了，每天的工作恢复了正常，对于我来说，为“非典”着急的日子结束了！

访谈 | 万希润 / 237

宋平：SARS 前线食堂负责人

王军：食材供货商

王元晓：SARS 回撤人员休养地保安

王钢：SARS 前线后勤保障人员

邓菊花：SARS 前线护理员

孟庆兰：SARS 前线护理员

医患一家亲，共度 SARS 情 | 潘 慧 / 244

我们可敬的“胖天使”一切安好吧！我的腿脚不方便，不能过去看你了，一份点心希望你能喜欢，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

怀孕的我与 SARS | 戚庆炜 / 246

我宝宝的第一次胎动，就出现在这么一个疲惫的急诊夜班的凌晨时分！至今想起这些来我仍是记忆犹新和激动万分，有时候病人问起我胎动的感觉时，我也会给她们讲述我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种小鱼吐泡泡的奇异感觉。

我的第一份遗嘱 | 万希润 / 258

儿子似懂非懂，在电话里用稚嫩的声音急急地说：“打 SARS！打死 SARS！使劲打！打！打！”

患者礼露：生死之间 | 口述礼露 主笔李菁 / 262

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这时候意识到，要不抓紧写，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爬起来，坐在写字台前，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再爬起来写。

六十二日 | Shanshanshui / 274

心空荡荡的，身体也轻飘飘的，思绪在无际的天空漫游。这时，枕下的手机无声地振动着。我摸索着，费力打开了手机，里面传来儿子的声音：妈妈好点了吗？你要早点回来，接着给我讲故事。

SARS | Andrew Perrett 万希润 译 / 291

医生和其他要害部门工作者坚守岗位——完美地展示了勇气和道德风骨。

后 记 | 万希润 / 295

SARS，一个国家的应对及其 公共政策选择

李 青

SARS 疫情，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改变了这个国家公共政策选择；而中国的选择，则又必须在国际规范的框架之内。十年之后的观察，这种变化是清晰的，但改变并未结束。

走进中南海

2003 年 4 月底，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们作一个讲座，主题是中央政治局定下来的：“非典型肺炎的长期防治”。这在当日可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最为关注的话题。曾光说他后来才知道：“平时到中央政治局讲座都是一位专家，最多两位，唯一例外的就是我这一次，去了三个人，等于是临时把我加进去的。”按原定计划，这一天是由科技部安排清华大学和中科院两位科学家讲中国科技发展。通常来作讲座的专家都要准备几个月，而曾光从接到通知到开讲，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

4 月 28 日，在卫生部领导的陪同下，曾光来到中南海。这是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所有委员都坐好以后，大家都等着胡锦涛总书记过来。徐冠华和高强

带着我们三个讲课的人在门口迎接。胡锦涛总书记到了之后，徐冠华向他介绍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职务，今天讲什么内容等等，总书记轮流和我们握了手。”

除了温家宝总理因出国访问而缺席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员悉数到场。大家围坐在椭圆形的桌子旁边，曾光的对面便是胡锦涛。各部部长、副委员长还有部队领导人也在旁听之列。

讲稿是提前准备好的，也由卫生部领导审查过。在这规定的40分钟里，曾光讲了很多重要问题，比如传染病的防治主要靠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未感染人群——这其实也是流行病控制最常见但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给领导人以信心：在全世界，只要这么做，没有失败的。我们这么做也一定会胜利。”读完这部分讲稿之后，曾光又脱稿讲了几段稿子里没有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呼吁疫情公开化。“卫生部之前不敢让我去说这方面的话题，我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去讲。我说必须向老百姓公开，老百姓有权利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对自己采取保护措施。”

因为这部分是脱稿讲话，曾光发言的时候，高强绕到他桌子旁边敲了敲桌子：你胆挺大的嘛！实际上曾光已经注意到，胡锦涛听了他的话不时点头，吴仪也一样。

三位专家的课全部结束以后，胡锦涛和其他人开始提问。“他们提了十几个问题，都是我讲的内容，没有一个提科技发展的问题，当时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SARS这里。”曾光还记得，吴邦国提的问题比较专业，也能感觉出他掌握了很多信息。曾光还专门表扬了一句：“看来我们的委员长要成为传染病‘非典’专家了。”吴邦国听了也很高兴，课下还专门找曾光合了一张影。领导们讨论得也很热烈，全部集中在SARS的防治方法上。

在讲完课回去的路上，曾光问高强为什么敲桌子，是不是讲错了什么。高强连忙否认，只是说：“让你讲40分钟，你超时了。咱不能超时，首长的时间是宝贵的。”高强又对曾光说：“你注意到没有，总书记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

十年之后再重述这些细节，对曾光而言，绝不是对其个人经历的一次炫耀；对读者而言，也绝不是对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次窥探，其意义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公共卫生问题被提到空前的重视高度上来。“SARS以后，政治家们

也认识到了在公共卫生这一领域里，他们承担了首要责任。”

“公共卫生专家其实是第三批才上场的。”在中国疾控中心办公楼接受采访时，曾光提醒我们仔细回顾一下 2003 年媒体与公众关注度的变化，“SARS 最开始爆发的时候，领导人最关心的、媒体报道最多的是医生治病救命——这个非常正常，因为中国古代各种瘟疫流行，都靠临床大夫解决。什么神医喜来乐往井里放什么东西就解决了瘟疫之类的，所以不光是领导人，包括老百姓都对临床大夫有很大期待。”

“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临床大夫是很优秀，但是怎么连医院都不能自保，成为传染源了？这时候受到关注、最出风头的是谁？是高科技防治，是科学家们。当时媒体经常报道国家领导人去考察实验室，跟着名学者谈话，当时就是想尽快研制出疫苗。很多专家希望利用专长来控制 SARS，他们需要利用高科技研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国家也很慷慨，谁说能研制，马上投入巨额资金。当时我记得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一上午就分光，一个领导人考察过的实验室，就能拿到很多科研经费。当时就是希望以超大跃进的速度来应战 SARS。”

“现在看，在 SARS 疫苗上我们几乎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是研制出了 SARS 诊断试剂——但不光是中国，国外的诊断试剂也出来了。现在客观地说，全世界最权威的机构，最有能力的跨国公司，研制出疫苗最少也要十年。只靠自己力量，那么短时间就研制出 SARS 疫苗，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光直言不讳地评价说。

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急切寻找攻克 SARS 途径的心态多少可以理解。“到了最后，人们意识到还是需要公共卫生专家控制疫情。所以卫生部挑选专家去给中央政治局作讲座，找的不是临床医生，也不是高科技专家，而是公共卫生专家。”让曾光更感慨着公共卫生专家角色的变换。“在此之前，公共卫生专家话语权很小，公众和领导人知道那么多临床、科研专家的名字，但不知道任何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名字。”而 SARS 之后，无论“甲流”还是禽流感，在或大或小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像曾光这样的专家们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公共卫生专家知名度和被认知度的提高，其实折射出的是这样一个更有意义的事实：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极大进步。“SARS 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让政府和社会都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中国疾控中心前任主任、现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李立明评价说。“虽然说当时我们没有很从容地应对这个问题，但是 SARS 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提高，大大推动了中国疾病控制事业的体系建设和队伍建设。”

重建防线

2003 年 3 月 1 日凌晨，在广东做生意的 27 岁的山西商人被 120 救护车直接从太原拉到北京。她因为高烧回到山西太原治疗一段时间仍不见起色而进京求医。她先是来到三〇一医院，后来被转到三〇二医院。她这一家的转入，三〇二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 74 岁的姜素椿医生。这位女患者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 SARS 感染者，由此也开始了 SARS 在北京的蔓延。

其实早在 2002 年底，当“怪病”在广东爆发时，卫生部曾派过两批专家队伍前往调查，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应对之策。2003 年 2 月，卫生部又派出第三批专家组前往广州，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专家组的规模和资质都有了明显的“升级”：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常驻在广州，坐镇指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时任国家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担任副组长；下设三个调查组，临床组的组长是钟南山，流行病组组长是曾光，病原组组长是梁国栋。

“客观来讲广东省和卫生部当时也都比较重视，”曾光说，“之所以还会传到全国，就是因为各地到处是干柴，一颗火星过来就会燎原。而且因为航空拉近了北京和广东的距离，有个火种就能传播开来。”

在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看来，信息的封闭和隐瞒是导致“火种”传播的重要因素。“当时广东已经人心惶惶，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可是信息仍旧是封锁的。如果外界早知道传染病的真实情况，那位女商人至少不会从广东跑到山西，把病带到山西而毫不知情，又带到北京，把病传开了。”

当时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必须上报的传染病就是被列为甲类传染病的鼠

疫和霍乱这两例，所以对 SARS 疫情的封锁多少也钻了这个空子。“而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任何大规模集体爆发的疾病都要报告，不管是哪种病。”杨功焕说，“后来我们也参考了世卫组织的那种方法：不明原因的肺炎都要报告。实际上 SARS 最初的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肺炎，这种疾病报告了之后进行排除，就能抓到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包括禽流感也是这种情况下发现的。”

另一方面，各地防疫站日渐退化的专业能力，也是 SARS 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正确地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当时的防疫站全部变成要自筹奖金，自己挣工资，本来要上战场打仗的人都拉磨去了。实际上这十多年，它的专业水平一点一点被消融，SARS 期间疾控系统从上到下缺乏应灾能力，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杨功焕说，过去，防疫站最中心的科室是流行病室，“这是最靠技术的部门”，“后来因为要创收，环卫科这些能出去罚款的科室变得重要了。防疫站虽然名字还在，人也不见得出出了防疫站，但流行病科被严重地边缘化。”

“反思 SARS 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去反思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体制改革。”这是杨功焕感触最深切的地方。1990 年，从美国回来的杨功焕一直在建疾病监测系统，他说：“我一点点感觉到，起初大家觉得这里专业性很强，都很愿意做，但越来越觉得不想做，参与人员换成了刚分来的人，或者被淘汰下来的人。技术水平显然就会越来越下降。”这支基层的疾病监测队伍丧失了对流行病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在 SARS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大大小小的传染病没有间断过，但是没有真正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在此之前最大的一次就是 1988 年的上海甲肝。这也在客观上造成对公共卫生的忽视和淡漠。由此，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语权小也就不足为怪了。

“根据我从广东一线的调查来看，SARS 也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我当时总结出两点：它只有近距离能传播，只有出现症状以后才能传播。而且对于任何传染病，只要掌握其流行规律、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流行。”对曾光来说，那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让自己的专业意见

被政策执行者听见并采纳。

“流行病控制的手段一直都有，但搞公共卫生的人一开始没有影响力。”虽然曾光的身份是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但在当时他的影响更多是停留在专业技术层面，而无法直接干预政府对流行病采取的决策。“我们当时都很关心北京的疫情，随时等着参战，可是按那个时候的体制，只有北京市提要求，国家疾控中心才能进驻，我们自己没有权力进去。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不被听见，谁来负责战略问题？怎么能打赢这场战役？”

曾光没有想到的是，2003年4月15日，他以国务院督查组专家的身份进入北京。“当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点名要我进去，张部长说这是首都，首都感染了可不得了，你有多大能耐使多大能耐，先帮着北京控制SARS。”曾光回忆，他转而又说：“当然SARS之后必须要有人负责，但是公平地说，张文康当时也做了不少努力。而且公共卫生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问题，把所有问题都简单地归到一两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

当年，无论是卫生部相关领导还是北京市有关负责人，都遭受“瞒报”的指责。现在再回过头看，真实的情况或许应该这样说：那个时候，北京究竟有多少感染者，没有一个人能掌握最准确的数字。中国现在所有的医院系统很复杂，对于北京市来说，这里既有由北京市卫生部门主管的医院，又有中央部委所属医院、高校医院和军队系统医院，“那么多系统互不通气”，可是病人又在这些系统内转来转去。当时北京市也很着急，北京市只能管市属医院，其他那些医院报给谁，怎么报，也搞不清楚，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所以，当年国务院督查组进驻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北京市卫生局连夜建立疫情报告系统。“那时候广东真实的数字我们掌握了，但北京市却不知道。因为过去他们觉得有保密的原则，都不能往计算机里输，真实的数据都记在领导的笔记本上。”不了解真实的数字，又谈何对策呢？所以在北京市工作的第一个晚上，督查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各个医院把真实的感染者数字如实汇报上来。